

## ●主持人语



接到四川人民出版社黄立新社长以及我的老部下、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延安的来稿,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:终于完成了一年十二期的组稿任务。

去年12月22日,凤凰文艺社副总编李黎微信通知我,他已经和《文艺报》有关领导商量(没和我商量),决定开辟“凤凰书评—编辑故事”专栏,每月一期,每期一整版,并安排(不是希望,更不是恳请)我组稿。三年前,凤凰集团决定开始振兴原创文学出版,我们和《文艺报》有了深入的合作,虽然我对文学创作、文学理论和批评没有研究,不过,但凡文艺社、译林社和少儿社让我干有关文学的事,我都坚决服从,决不敷衍,估计李黎认为我不会抵抗,于是直接“安排我落实”,并且当时我还没阳,有身体自信。但几天后我意识到了大自,并且在3天后阳了,昏昏沉沉躺了好几天。等到一月初责编来催稿,我还感到很虚弱,于是向李黎打起了退堂鼓,但他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,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好在当时世纪集团老领导陈昕写了一篇回忆他的老领导、老一辈出版家巢峰的文章,让我十分感动,于是求稿,竟得到陈总的慨然应允,然后我又请译林社陈叶以及我招聘进来的苏人社曾健为我各写一篇,她们也没敢说不。

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,我自己也没有想到。这一年,我绞尽脑汁,央求和我一起战斗在出版战线的名家新锐、旧友新朋写稿,度过了催稿时无赖、发表时亢奋的一个又一个月。除了各位大家新锐的编辑故事外,我也“感时恨别”地写每期主持语,从当月的气候大环境、人文大环境到个人小环境写起。我自己的想法是,让这些文字,连同各位同道好友的文章,共同构成一段难忘的记忆。

今年12月11日,北方有雪,南方地冻。

川人社黄立新社长是我的老朋友,我在苏人社担任社长时和他结下深厚友谊。黄社长多年耕耘川人社,成绩斐然、见解卓著,相信此文对出版从业者会大有裨益。

张延安是我苏人社时的老部下。他本月退休,周六约我吃饭。张延安是策划能力极强的编辑,可惜时运不济,中间走了弯路。他从集团北京公司回来后竟无处可去,余江涛老总安排到我所在的苏人社,当时遭到我的拒绝,不愿意接收是因为他整天嘻嘻哈哈、不太正经,我认为他很散漫。几年来,我发现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,就是当我逐渐看到他做事极其认真、为人极其真诚、与人交往十分靠谱的时候,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,我感到十分惋惜。如今,我也快到了退休年龄,这几年的经历也使自己逐步学会了嘻嘻哈哈和不太正经。我正在走延安的老路。

——徐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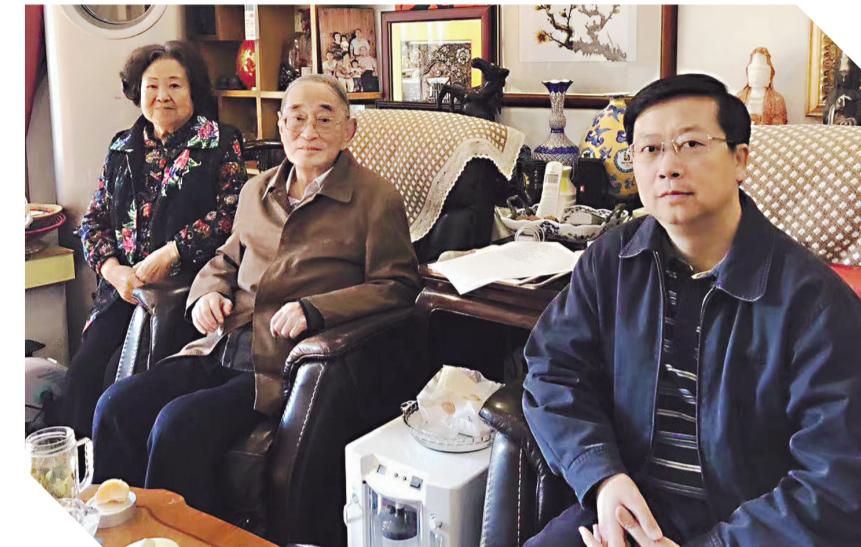
还有几天就到站退休了,面对桌上一堆堆已被收拾、叠好、码放整齐的文稿,总算轻松下来,这时聊聊20多年编辑生涯中有趣好玩的事情,也算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总结吧。思绪繁多,心情忐忑,说什么呢?一时想不起来有什么好玩的,只不过是些鸡零狗碎的琐事罢了,况且一个普通的编辑,实在也不可能有什么值得大费笔墨的事儿。

新世纪伊始,懵懵懂懂,不承想自己一头闯进了出版行业。这倒还真觉得“知识有用”起来了,学过几天外语,再加上一些特殊的个人经历,一下被江苏美术出版社时任社长高云先生相中了,热情邀我加入他的团队,从事版权工作。初入出版行业,一开始感觉吃力,无从下手。好在有高社长和其他领导、同事的支持和信任,加上自己“笨鸟先飞”,起早摸黑,下了一番笨功夫,也总算摸到了门道,居然变得有模有样起来。约莫半年之后,居然渐入佳境,工作也得心应手起来。这一时期,先后和讲谈社、小学馆、麦克米伦、剑桥大学出版社、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等国际知名出版企业建立了联系,引进了《闪灵二人组》系列、《西方当代视觉艺术》系列、《设计大百科》等品牌图书,打开了小局面,然而,却不能自满。常常在想引进版图书,对出版社而言,固然重要,但对编辑个人来说,总是个瘸腿跛脚的事情。我暗下决心,得搞点原创图书,用两条腿走路,这样才稳当,走得也远。

2003年初春的一天,出差在北京,恰好经过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门口。“这个大院子里应该有美术社需要的玩意。”我自言自语道,“进去瞧瞧呗,让我这个下里巴人也长点艺术细胞,沾点艺术气息,说不定还能有所收获呢。”进门转悠了一圈,院子并不大,也不那么艺术,心里顿有点失望,准备打道回府。刚走到门口,迎面走来一个身材不高、长相清秀,和我差不多岁数的人。我便上前和他打招呼,作了一番自我介绍,说明来意。没成想对方是个热情之人,立即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坐坐。真是“有缘千里来相会”,这个人就是后来和我合作近20年之久的刘祯先生。刘老师那时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,专门研究中国戏曲;他在江苏读的大学,也曾在南京短暂工作过。一下子我就套上了近乎,顿时天涯变咫尺,话题也开始热络起来。刘所长告诉我,他目前头正好有一个国家级项目《中国当代百种曲》

## 突围之道:理想、品牌与坚韧

□黄立新



黄立新(右)与厉以宁夫妇

最近,接到徐海兄安排的任务,要我写一篇关于出版的文章。按理说,对于干了一辈子出版的人来说,写一篇出版方面的文章,应该是驾轻就熟的,但实际未必这么乐观。从大环境来说,各家面临的问题都差不多,从具体来讲,又各有特殊性。想来想去,似乎可以将近几年的一些思考及做的一些事情,借这一园地作简单的介绍,以求教于同行。

### 作为出版人的理想

无论是当编辑还是当社长,我认为,首先是一个出版人,并将“做好书”作为起码的追求。这一点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,都是不可更易的。有人认为,工作首先是完成任务。这一点我不否认。但有什么工作能把人局限到仅仅为了完成任务,而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、人生追求?那样的世界有什么意思?对于一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又有什么意思?无疑,把自己锁定在“任务”这个维度,这是对自己职业、工作的自我矮化。一个没有情怀、没有追求的人,很难有所担当,而没有担当,又如何把事情做好?

每一项工作,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事者的主观性,主事者会赋予这个工作色彩。任务是底线,追求是高度。取法乎上,才仅得其中。要把职业做成事业,没有一点追求,不具一点情怀,是不可能长远的,更不可能百折不回,坚韧不屈。

抱着这个基本想法,我担任社长以来,一直在寻求突破。在地方社,经常会有一个观念、一种认识,那就是不只业务上在地化、地方化,而且在资源上、内容上也退守一隅。周围还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:他们可以,我们不行。对这句话,我时常感到疑惑。什么叫“我们不行”?一个人如果丧失了主观能动性,那这个事业要做好,怎么可能?再回到“地方”这个话题,如果不回归事情本质,回到“好书”这个层面来琢磨事情,实际就背离了我们干这行的初衷。而要说“好”,就需要去拓展,去融入,与全国的甚至是世界的一线的作者打交道。当然,这首先就得知道什么叫做“好”。这也是需要我们不断修炼的内功。内功弱,就容易被忽悠。

记得之前看到三联出版社的社庆,他们请了一些作者录制视频。其中,著名学者甘阳说到作者和出版社并不仅仅是纯商业的关系,而是有共同的感情基础。这不禁让我想起范用老子和昌文公,说出版就是吃吃喝喝,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出版社和作者的关系,是一个观念和感情的共同体,而不仅仅是金钱的关系。也只有在这个共同体之中,才可以随时跟他们请教,了解现在的动态与前沿,知道并且把握什么是“好”的内容,而不是闭门造车,自我想象。

所以说,突围首先是观念的突围,只有在观念的突围后才有行动的突围。对我们来说,无论在哪个品类,哪个领域,都要去找“好的”作者、“好的”选题。对“好”的评价,可能因人而异,但要多维度来综合衡量。首先是就选题本身,其

次,是目前的市场。必须综合评定,不能标准单一化。如果单一化,会错过很多优质选题。

### 以品牌为突围

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历史传承的综合性出版社,品类繁杂是一个常态,要想在现有的基础上迅速聚合起品类,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而近几年兴起的出版品牌化的趋势,提供了很好的思路。在2018年的一个场合,我与一位对学术出版情有独钟的年轻人封见龙见了面,在聊天的过程中,能感受到他对学术出版的浓烈兴趣,并且对他学术界、学术领域的熟悉程度,也很让我意外。四川人民出版社曾经推出了不少优秀的学术书,但没有成系统、成产品线来做。如何延续这样一种好的传统,整合我社学术出版资源至关重要,于是我就决定以这位年轻编辑为依托,创立一个品牌,以专做优秀的学术著作作为宗旨。

但事情并非如此顺利,一开始社内外就出现了不同看法,并不看好我们要走的这一步。我们的学术团队组建后,我对团队小伙伴们说:“不管外面有什么说法,既然想好了要走这条路,我们就坚定地走下去。”我们为这一学术品牌取名为“壹卷YeBook”,意思就是一本本地踏实把书做出来,拒绝花哨与浮夸,而这,也成为“壹卷YeBook”的品格。

我们的学术出版团队紧锣密鼓地拜访了许多学者,包括葛剑雄、甘阳、李伯重、耿云志、张海鹏、桑兵、杨念群、何俊、刘小枫、干春松、王家葵等,又去找了谭德锋等知名学术出版人策划系列丛书,这才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“论世衡史”“艺术史·事实与视角”“经典与解释论丛”等系列。就这样,“壹卷YeBook”这个品牌开始按部就班地依照规划,一步一步前行。

在“壹卷YeBook”品牌运行中,我们不但抓好选题,同时还不断拓展发行渠道。除了和社内的发行配合交流,我们的团队也在向外扩展,向一些实体书店、行业前辈请教,不遗余力地推广“壹卷YeBook”的产品。于是,才有实

次书店给“壹卷YeBook”设立专柜专架,在冒着经营风险的情况下,和我们签署全品种采购合作协议。他们不是对现有的品种进行全品种采购,而是对未来的品种,只要是“壹卷YeBook”的产品照单全收。这是“壹卷YeBook”团队和社里营销中心共同努力的结果。这是以品牌为“突围”的开端。

逐渐的,品牌效应显现出来,学者们会经常提到“壹卷YeBook”的产品。同时,网上也有人为此而欢呼,至今看到网友、读者的这些留言,我都依然会感动。读者在期待,读者有眼光,是我们辜负了读者,好在现在逐步扭转了这种被动局面。“壹卷YeBook”作为一个初创的学术品牌,从经济效益来讲,虽不如其他品类的效益可观,但整体上保持了盈利。我们近一半的图书实现加印,一些大家都觉得不会好卖的图书,都实现了增长。比如,葛剑雄的《中国人口发展史》,最开始签下合同,是在2019年初,到稿是2019年上半年,那个时候人口问题还没有显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广泛热议的话题,加之这又是再版书,谁都不敢保证最后的销量。但我们坚信,从内容来说,这是重要的学术著作,它不一定短期内卖多好,但一定会长销。这一坚信来自经验,来自“文化自信”,不是数据分析,当时也没有数据可供分析。这本书在2020年出版时,突然人口问题成为全国各个层面都在热议的话题,这本书一下变成“生逢其时”,上市仅一月,就实现加印,两三月就突破一万册。当然,这跟畅销型的图书依然没办法比,但是,与我们最初对这本书的心理预估和期望来比,实在是出乎意料。很快,全球知名的学术出版机构泰勒·弗朗西斯还引进了这本书的版权,出版英文版。

当我们的产品陆陆续续面市时,又有一种观点认为,“壹卷YeBook”的这些书虽然广受好评,受读者的欢迎,但却是属于“非主流”,不能满足“主流”的期待,说得直白些就是不能拿大奖。而事实并非如此,2022年,孟宪亮的《武则天研究》斩获一系列大奖:《中华读书报》年度十大好书、中国历史研究院“五

部优秀著作”、文津图书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。另外,孙卫国的《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: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(1637-1800)(修订版)》获得韩国“亚洲图书奖”中国出版图书提名;李虹的《死与重生:汉代的墓葬及其信仰》获第十五届书业年度评选“年度历史类图书”等。

在2023年的BIBF期间,“壹卷YeBook”与施普林格旗下的麦克米伦公司签约,由麦克米伦公司整体引进“壹卷YeBook”的“论世衡史”系列。麦克米伦公司每年会在“壹卷YeBook”所出版的图书中,选择合适的品种进行立项,在购买版权后进行翻译,在欧洲出版,将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给全球学界。这既是国际学术出版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,也是一种对出版价值的认可。当然,我还记得,今年11月,我在伦敦拜会泰勒·弗朗西斯出版集团全球图书业务总裁贝谨立先生,告知他我们的“论世衡史”系列已整体和麦克米伦签约时,他表示很遗憾。我赶紧告诉贝谨立先生,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学术图书系列,同样非常优秀,我们也期待与泰勒·弗朗西斯出版集团建立更深的合作关系。

目前为止,“壹卷YeBook”储备了非常丰富的选题,已签约待出的各类作品即有160余种。而且,已经布局了10个系列的产品,如:论世衡史(中国的优秀历史学研究)、往事与随想(学术随笔、回忆录)、近观(日本的中国学)、“经典与解释”论丛(西方古典学研究)、国学新知(中国传统学、国学研究)、艺术史·事实与视角(艺术史专题研究)、Know(西方现代哲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)、走向中国(近代日本或欧洲关于中国的史料与专注)、励耘(公版书·现代学术经典)、壹卷精选(学术大家、经典著作、最新力作,以及优秀的文化普及类读物)等。

以“壹卷YeBook”为例,一个品牌的发展过程中,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质疑,但在质疑中,我们要有超常的定力,才能不断地坚持下去。

### 以“好书”立足

我们作为一家综合性的地方人民出版社,无论是主题出版、学术出版、大众出版哪一个方面,都要以追求“做好书”来作为一贯之道。也只有不断地推出好书,我们才能在行业内真正立足。我们看上海人民出版社、江苏人民出版社等,他们就是在严把图书质量的前提下,逐步成为行业佼佼者。而在最初,谁也不会认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的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可以长销三十五年,影响几代中国知识分子。作为地方人民社,更要集中精力,在“好书”上不断琢磨,心无旁骛,这样积累五年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,才能筑牢根基,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。而“好书”的标准,则需要我们不断地揣摩,只有把握本质,知止而后定,这样才有可能突围,才能真正立足。

(作者系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)

## 一位普通编辑的退休小结

□张延安

即将进入尾声,可以考虑一起合作。这就是机缘。

对于戏曲,我完全是个门外汉,但短暂的交流,我就相信刘祯所长,他说好的东西一定是个好东西。于是,这一项目就这样花落美术社,最后获得了2005年度“中国图书奖”提名奖。

2007年,又是一个春天时节,时任美术社社长顾华明向我交代一个重要的任务,务必想办法和画家范曾取得联系。对我来说,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,心里根本没底。硬着头皮登上当晚进京的列车,心里一直寻思着所有可能的线索。第二天一大早,下了火车便直奔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。我知道该社总编辑贾德江老师在京城美术圈交游甚广,他或许可以帮上忙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通过贾总,我和范先生的经纪人徐斗取得了联系,并约好日子登门拜访。

一周以后,顾华明社长、卢浩老师和我约会登门。

范曾也是江苏人,和顾社长还是南通老乡,随性而率真。坐定后,他们叽里咕噜,直接用家乡方言就聊上了。待进入正题,我们就开始讨论图书的方案和体例,很快敲定整体框架。在先生的指导下,他的多名学生参与了书稿的整体编撰工作。人多力量大,三个多月后稿子便大功告成,接下来就是紧张烦琐的编辑工作。因为当年10月是他70大寿,需要在此之前完成出版。其间我又多次登门拜访,解决编校过程中遇见的问题,先生亦不厌其烦,一一予以解答和释疑。经过几个月紧张忙碌地工作,到9月底,《范曾诗文书画集》终于以精美装帧、优秀的质量出版了,先生非常满意,夸赞说这是他所有著作中最精最漂亮的一套。

2015年深秋,我约请老朋友刘祯(当时已调任北京梅兰芳纪念馆馆长)前往北京凤凰台饭店小聚。席间,我提了个现在看来非常幼稚但意义十分重大的问题:为什么黄梅戏起源于安徽,越剧诞生在浙江,二人转发轫于东北?他立即纠正我说:“二人转是一种民间艺术形式,和另外两个不同。”我进而提问道,能否出一套类似的书来科

普一下?刘祯说,这是个好主意,以前还真没有系统出版过类似的图书。正是这一提问,诞生了“中国戏曲艺术与地方文化”丛书系列(第一辑,共10卷)这个选题,歪打正着。

2017年初,兜兜转转,我回到了南京,就职于江苏人民出版社,徐海社长收留了我。从此,我开始了按部就班、中规中矩的工作。2018年8月,刘祯主编的“中国戏曲艺术与地方文化”系列丛书陆续到稿。为了体例的整体统一,再加上喜欢单打独斗,我便一头扎进了这个浩瀚的编辑工作中。此中苦乐,不说也罢。两年多的孜孜不倦,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。这一系列图书于2020年4月出版,被列入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,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,后又入选“中华民族音乐传承精品出版工程”。

经过对此书系的编辑,耳濡目染,我对戏曲也有了些初步了解。2019年盛夏,为了该书系第二辑的组稿事宜,我再次拜访刘祯馆长。因该书系过于庞大以及作者的不确定性,一时半会难以推进落实。刘馆长随口提起了他目前手头的项目,说他正在搜集整理梅兰芳海外公演的相关资料,打算结集出版。我立即恳求他,最终的出版事宜宜交由我社负责。刘馆长似乎有点为难。我紧追不舍,最终他勉强点头答应。生怕夜长梦多,没过几天,我便拉上徐海和傅建明两位一起北上到梅兰芳纪念馆拜访。两位老总出马,合同一签,尘埃落定,万事大吉。事后我才得知,这事确实难为了刘兄。出版事项他先前已初步答应了其他出版社,但最终还是因为我的真诚和20年的友谊才交给我们社。

2021年下半年,书稿陆续到稿,经过多次商定,书名最后确定为《梅兰芳菲》。在编辑的过程中,我发现整个书稿的图片十分精美,有的甚至是首次公开,再加上作者优美的文字叙述,突然异想天开,这套书是否可以考虑冲击一下“中国最美的书”这一奖项?于是便向分管领导说了自



己的想法,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和支持。延续我一贯的风格,单枪匹马,苦熬了近两年时间。今年6月,《梅兰芳菲》正式出版,并在梅兰芳纪念馆举办了新书发布会。这套系列图书不仅入选国家“十四五”出版规划,也被列入“中华民族音乐传承精品出版工程”。11月,又荣登2023年度“中国最美的书”榜单,为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23年的编辑工作,酸甜苦辣,个中滋味,冷暖自知。前几天在整理资料时,发现有不少获奖证书和荣誉证书。我清点了一下,居然有28张之多。人间值得,问心无愧!在此,我想对我的后来者们说:想要寻找优秀的作者,需要真诚和用心,而优秀的作者正是编辑的衣食父母。这些年来,能取得这些成绩,除了自己的努力和付出,和领导的支持、同事们的帮助密不可分。衷心感谢我遇到的所有领导,当我身处困难时,你们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;衷心感谢我的同事们,在我需要帮助时,你们向我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。再过几天,我就到站下车了,职业生涯就此结束。以上的点点滴滴,只是我编辑生涯中的一些小故事、小插曲,更多故事,还是留待日后在我的书中细说吧。

(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)